走向现实主义新天地

——张恨水抗战作品创作漫评

郑炎贵

今年是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纪念年份。伟大的抗战精神为中华民族精神注入了新的元素和丰富内涵，是值得我们永远珍惜的精神财富。因此，弘扬抗战精神的文艺作品也格外受到青睐。然而本人发现在诸多盛赞抗战小说的文章中，推举的基本都是新文学作品，如《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小兵张嘎》等，几乎无一提到张恨水这位创作抗战小说最多的作家作品，看来张恨水先生的那顶“通俗小说代表性作家”的头衔，仍如张锲先生所云：“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某种贬低的意味。”

正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一样，文学中的严肃与通俗，正是从整体上体现社会文化心理实际所需要的平衡状态；二者各有所长与所短，它们在发展中互补、互助、互促，共同推动文学事业繁荣。对于这种与群众保持着广泛联系，胶结生存于社会生活与文化土壤的能力很强的通俗小说，必须充分尊重其活动的空间与存在价值，对于张恨水等通俗文学作家的成就必须实事求是，值此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张恨水抗战作品创作，主要是抗战小说的创作观念、特点与成就，无疑会进一步有助于我们认识张恨水在推动通俗小说现代化，为民族救亡事业服务的过程中的独特贡献，并有助于进一步揭开他与新文学关系之谜。

书生顿首唤国魂——主题转换

自学成才的张恨水从事文学之始，动机并不崇高，文学观也传统保守，他曾坦率地承认：一是因为爱好，二是为了满足发表欲，三是为了谋生；对于小说的性质与功能，亦以“小道”、“消遣品”与“稗官家言”、“雕虫小技”而夫子自道。

然而，张恨水是一位“不肯和时代思潮脱节”的写家，经受过新文学阵营的影响与读者的批评，特立独行于章回小说改良之路的张恨水逐渐产生了“叙述人生”、“有益于人”的文学观，他明确提出：“吾作小说何如使人愿看吾书，进一步思之，如何使人读吾小说而有益”；（1）希望读者“以予为友”。从《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作品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种前进的轨迹。作者从自己新旧教育熏陶出的道德价值观出发，努力反映一些具有时代特征的积极主题，揭露当时社会时弊与人生不平，笔端常常折射出反封建、反军阀的时代精神与民主主义思想光彩。但有时，为卖文亦作“游戏人生”之举，如1930年前后问世的一味表现“士”阶层颓废生活的《斯人记》及《鸡犬神仙》《青春之花》等，有时亦将“琐屑的没有意思的故事”敷衍成篇；有时则“随意想，随意写”，（2）“九·一八”事变后，山河破碎，豺狼入室，生灵涂炭。血与火的现实激起了先生“渴饮匈奴血”的爱国主义豪情，加深了“哀民生之多艰”的忧患意识，由于受到孙中山倡导的民主主义思想的感染，加之后来在重庆多次接触共产党人，人生观与思想觉悟不断提高，促发了文学观的与时俱进，明确提出了创作国难小说与抗战小说的主张，他自编《弯弓集》并在《自序》中大声疾呼：“今国难临头，必以语言文字唤醒国人……则虽烽烟满目，山河破碎，因不嫌其为之者矣。”此后还多次重申：“抗战时代，作文最好与抗战有关，这一原则，自是不容摇撼。”他在编辑新民报重庆版副刊《最后关头》的发刊词中声言：“取这个刊名的涵义，在于充分呐喊，非努力争取胜利不可”，“一切‘诗词小品’，必须与抗战及唤起民众有关。”

应该说，对于张恨水这样深受儒家思想浸润的知识文人，战争好比催化剂，高涨起他心灵深处的忧国忧民之思、大义凛然之气，使其越来越密切联系时代风云，创作态度日趋严肃。“愿将热血神州洒，化作人间爱国花”、“石虽可毁，坚不可销；丹虽可磨，赤不可灭”，一度计划投笔从戎但请缨无门的张恨水决定以笔弯弓，“略尽吾一点鼓励民气之意”，在文学观上逐渐偏离了“小道”的轨线，带有大道的性质——“书生顿首高声唤，此是中华大国魂”，自作《健儿词》以明大道之志；在编者启事中明确主张：“唯最后关头稿件，顾名思义，殊不能纳闲适之作。”张恨水不仅以极大热情倡导爱国通俗文学，而且积极身体力行，创作了大量的抗战小说与国难小说，据统计，自“九·一八”事变后至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其抗战作品共达800万言，约占其一生全部创作总量的1/3，其主体为国难小说与抗战小说，其它为诗词、杂文、散文等。

纵观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人的意识、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是同时并存其间的三大核心意识，由此而相应产生出三个中心主题，即启蒙、救亡和翻身。（3）强烈的爱国精神与民族感使张恨水的写作在抗战时期来了一个大转变：自觉地将包括个人爱好在内的私人情感让渡于国家情结，将国家、民族的救亡作为自己文学创作的主题。于是在这个“多难之秋，殷忧启圣”的非常时期，张恨水与新文学家在创作主张与创作主题上同归于干预人生、切近现实了，正如朱自清所言：“抗战以来，第一次我们获得了真正的统一。”

现实主义新境界——创作升华

1944年5月16日，代表共产党喉舌的《新华日报》在短评《张恨水先生创作三十年》中明确指出，张恨水先生“和旧型的章回小说之间显然有一个分水界，那就是他的现实主义道路”。

由于张恨水是“不幸生在过渡时代”的“过渡人物”，因而他真正走上现实主义道路经历了“迂徐渐进”的过程。

他来自旧营垒，一开始属于旧派文人的“胚子”，养成了“专爱风流才子文人隐士的思想习性”，五四运动后，他受到鼓舞与新思想的启迪，开始通过对章回小说改良的办法，创作了一批引雅入俗的社会长篇小说，逐渐表现出“大规模描写中国社会的气魄，（4）”按作者自己的说法，乃是一批“写现代事物的小说”，是“现代的反映”，且贯穿着一条主线：抨击强暴，同情弱小，揭露黑暗。作品中大量社会生活的描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现实主义倾向，触及到社会矛盾的某些本质方面，如《金粉世家》触及到妇女追求人格独立问题，《新斩鬼传》影射民国初年社会弊端与鬼怪风气，《啼笑因缘》表现出男女平等、追求婚姻自由的思想倾向，但由于受传统价值观念束缚，由于恪守超政治，“主义非吾敢谈”的立场，故在题材的把握上难免滑行于生活表层，主题开掘不深，影响了他“叙述人生”的批判深度，如《金粉世家》虽暴露了金家子辈寄生虫式的精神面貌和当年上中层社会的腐化堕落，但最终却没有从制度背景的根本上去挖掘兴衰原因，而是归之于“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春明外史》写到杨杏园与李冬春的爱情悲剧，塑造了那个新旧交替时期、沉溺于传统意识、落伍于时代的书呆子形象，但作者却把悲剧根源归之于“齐大非偶”。

如果说，在抗战以前，“是正义的道路把他（指张恨水）引向现实主义”，（5）那么真正让这位职业写家迈入现实主义创作升华新境界的则属抗战时代。抗战把中华民族命运问题推到了时代的最前端，造成了民族意识的空前统一，从不参加任何党派组织的张恨水第一次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并成为理事之一，理直气壮地宣称要为说中国话的普通民众工作，要“两副重担”一起挑，使本土文化与西洋文明交流，“以产生合乎我祖国翻身中的文艺新产品。（6）

张恨水抗战作品中的主体部分——中长篇小说共有四十部左右，其中写于八年抗战时期的有近三十部，从题材上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直接关乎抗战主题的小说，包括《桃花港》《潜山血》《前线的安徽、安徽的前线》《游击队》《冲锋》《大江东去》《虎贲万岁》等；第二类是讽刺暴露小说，包括《疯狂》《八十一梦》《魍魉世界》《偶像》《五子登科》等；第三类是历史和言情等其他小说，包括《水浒新传》《秦淮世家》《丹凤街》《石头城外》等，这种分类格局与新文学相同，在时间上也与新文学作家彼此呼应，即在抗战初期以抗战小说为主，后期以讽刺暴露为主。作品大多侧重于描绘客观生活场景，描写抗战典型环境中的各色各样的形象，普通老百姓、小人物，基层官兵占据了重要地位，并注意到了细节的真实刻画。在初期的抗战小说中《冲锋》完全遵循写实原则，真实地表现了日寇侵占天津时的狂轰乱炸与血腥杀戮，再现了“天津将陷落时那一角落的现状”，通过三次巷战的描写，勾勒出一个由普通教员锻炼成长为一个善于发动群众、善于指挥战斗、也善于思考国家前途命运的杰出抗战志士——张竞存的形象；《大江东去》在国内首次用文学形式揭露南京沦陷时日寇灭绝人性的大屠杀罪行；《敌国的疯兵》在触及战争扭曲人性问题上，表现出一定的现实主义解剖力度与深度。

相比而言，抗战后期张恨水的讽刺暴露小说更具现实主义的批判性，明显加深了对人生对社会的批判，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作品的倾向从过去的“叙述人生”上升到自觉地“要替人民呼吁”的现实主义新境界，艺术风格也由从前的“言情为经，社会为纬”而转变为“社会为经，言情为纬”了。和张恨水早期的新闻化小说不同，抗战后期作品贯穿着统一的叙事立场，充满着观照人民大众根本利益的正义感和深切的民族忧患意识，作品表现社会生活更加深入，揭露腐败政治与官僚政客的锋芒更加尖锐，以《八十一梦》《魍魉世界》《五子登科》最具代表性。

《八十一梦》是张恨水为通俗小说在主流文学史上争得一席之地的扛鼎之作。小说以幻想形式、比喻象征手法，通过梦境描写，暴露了国民党官僚阶层擅权仗势，投机倒把，巧取豪夺，大发国难财的丑恶行径，其梦境“其实就是讽喻重庆现实的”，处处都体现着作者强烈的批判意识与自省意识，反映了作者清醒的现实主义“识力”与智慧。如第五梦结尾道出的“天下事，一切都是富人的机会，一切都是穷人的厄运”这一呼喊，饱含了作者在机遇与国民素质的关系上的深刻思辨与卓识；第十梦对狗头国人奴性的刻画极具艺术概括力和典型性，“外国的耳光是比本国的耳光值钱”、“一耳光之下百病消除”——这一细节描写内涵丰富，令人想起古时的贾桂与现代的汪精卫，与《阿Q正传》批判民族劣根性有着同工异曲之妙！无怪乎这一小说赢得毛泽东与周恩来的高度赞赏！

《魍魉世界》系《八十一梦》的姊妹篇，与梦幻不同的是，《魍魉世界》以留学归来的心理学博士西门德出场引出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前方将士出生入死，大后方重庆却是醉生梦死；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社会上盛行的是“狗才第一，奴才第二，蠢才第三，人才第四”的反文化反人性的逻辑，作者借老教育家区老太爷的嘴诅咒：“这就是重庆的一群牛马，白玷辱了这抗战司令台畔的一片江山”！作品怵目惊心地暴露了一度“在意识上觉得它是正统”的政权在一片歌舞升平背后的颓败，“传达了一种制度大厦即将倾覆的崩裂之声。”

在抗战胜利不久写出的《五子登科》，直接针砭现实，通过描写接收大员与汉奸勾结大发劫收财，沉醉于“金子、车子、票子、房子、女子”之中的丑恶嘴脸，为世人描绘了一幅蒋家王朝的“西风残照图”。这在本时期进步作家的全部作品中也不愧为罕见的进步作品，作者曾在《最后一关》一文中指出：“复原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朋友，笑罢，笑了还得冷静头脑想一想……长期呻吟于日寇铁蹄下的人民又置身于国民党奴役之下”，可见作者早在抗战胜利后不久即预感到新的危机，政治上的卓见已直接影响到作品创作，此时的张恨水已走到时代的前列了。

如果说抗战前期的张恨水，更多的是把自己作为一个实际的抗日救亡的战斗员、宣传员，而不仅是一个作家，因而在近距离反映抗战现实生活的同时，难免出现因情绪浮躁导致审美追求弱化的趋势，那么随着战争的进程，当人们意识到这场抗战从根本上来说也是中华民族自身的一场改造运动时，张恨水亦与广大文艺工作者一样，自觉地在文学观念、价值取向、审美追求诸方面实现了深化、超越和刷新，应该说张恨水的创作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才有了更具实质意义的转变，即由原来迎合市民读者的流行小说作家，而真正成为腐败社会无情的诅咒者和批判者。

史存光照意蕴长——立场使然

今天我们对于抗战胜利的缅怀，最好的纪念就是把抗战精神宣传好，以利于继承发扬光大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

所谓抗战精神，其实就是在民族危亡关头，全国各族各界群众不分党派，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不畏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同仇敌忾，奋起抗争，夺取胜利的精神。

翻检一些尘封的史料，我们欣喜地看到当年在民族救亡图存大业的共同目标下，作为新闻界大团结中的一员，张恨水先生是言行一致地奉行这种精神的，其有力的证明就是，在纪念先生创作三十周年之际，新华日报负责人潘梓年先生作为进步力量的代表，对张恨水作过一个非常明确的评价：“恨水先生所以能够坚持不懈，精进不已，自然是由于他有他的识力……他的修养，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由于他有一个明确的立场——坚主抗战，坚主团结，坚主民主。”潘先生赞美张恨水的“三坚主”恰恰也概括了抗战精神的要义。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认为，作家的世界观特别是其核心部分的哲学观、政治观对文学创作是有着一定制约作用的。毫无疑问，作为政治观重要内容之一的政治立场，自然是直接影响作家对生活的观察与反映的最密切的攸关要素，正如潘梓年先生所云：“立场不进步，他就看不清现实，甚至看不见现实”，“立场不明确，……他就不能在自己的作品中显现出自己特有的风格。”

应该说抗战以前，张恨水正是由于坚持“平民作家”立场而促成了他的“成于渐”的“叙述人生”之路，即不仅承认新派小说的先进性，注意在写作中学习吸纳新文学的技巧，增加景物、心理及“小动作”（细节）描写，淘汰章回小说过时的老套；同时还下决心纠正新文学对大众的漠视和过分欧化的弊病，终于在文艺大众化方面，远远走在新文学作家的前面。而自加入抗敌协会，成为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之一员以来，传统文人骨子里浓厚的国家情结与人文情怀中“以天下为己任”的美德，被拯救民族危亡的特殊使命激发得更加耀眼，先生的立场进一步向“团结、民主、抗战”的时代潮流靠拢，小说过程发生了新飞跃，与新文学阵营的关系由疏离怨怼而调正为对话合作，更加自觉地学习现实主义理论，接受新文学的主要创作态度和创作方法，真正成为“善为扬弃，使章回体延续了新生命”的奇迹创造者；其创作“作风突变，对政治社会，讽刺独多，无一不与抗战建国有关”；（7）至于言情娱悦已退居从属地位。凡为文，恨水先生均严格按照生活本来面目去写作，“不肯以茅屋草窗下的幻想去下笔，必是有事实的根据”。（8）许多作品都有真实具体的人物事件原型。特别值得强调的是，由于先生坚主团结民主抗战的立场，因而在实际写作中已打破意识上的“正统”与非正统的界限，通过“中间偏左”的策略运作，突破当局新闻与文化封锁，对大后方与前线、国统区与共产党领导抗日根据地均予以现实主义的观照或反映，其“偏左”显然是倾向进步，“中间”不仅仅是为求得报纸生存而被迫采取的策略，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张恨水等《新民报》负责人坚主团结立场、不受任何政治偏见左右的正直品格。因此张恨水抗战作品实际上是我们今天研究抗战史、抗战精神的“信史”，其客观性、真实性与生动性可能是一般抗战历史教科书所无法比拟的，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起到“还历史以真实，弃偏见于永日”的借鉴作用。

1944年初夏，国民党被迫同意组织了一个中外记者团到延安，重庆新民报主笔赵超构参加该团活动，返渝后写成长篇通讯《延安一月》在重庆与成都两地的新民报连载，一时哄传遐迩，名噪后方。当年十月又结集出版单行本，书前有张恨水所作的《序》，由于《延安一月》系统地反映了共产党人的言论和边区各方面的真相，起到了以事实驳斥反动势力攻击诬蔑共产党的作用，被周恩来誉为“中国人写的《西行漫记》”，毛泽东对作者可贵的胆识赞赏有加。但长期以来，外界不太清楚或者说也不在意张恨水作为当时新民报重庆社负责人对其属下主笔赵超构的这一举措的态度与影响，几乎未见有人去认真解读过张恨水当年为《延安一月》所作的《序》。笔者有幸，在事隔47年后随张恨水研究会副会长徐继达一行于1991年6月19日在沪登门拜访了赵超构先生，赵老深情地回忆了当年张恨水支持鼓励自己采访写作《延安一月》的经过，他说：“张恨老主张对延安的情况的报道一定要采取客观的态度，这在当时国民党反共逆流中是很可贵的，我把他为我这本书写的序复印好了，你们带回去作资料保存。”

拜读这篇与世久违的《序》，笔者认为张恨水对《延安一月》的问世曾起过非常重要又十分难得的指导作用，《序》中写道：“……这次赵超构兄去延安访问，事先曾和朋友商量，应当取一个什么态度？我就很简单的贡献一点意见，观察最好一切客观”，“事实的存在是一件事，对于这存在的事实作何感想，又是一件事”，其言下之意，显然是在提醒赵超构此行不要受任何人为主观因素影响，要着重于事实的客观报道；《序》文还写道：“赵兄对我这点意见，相当的采纳……自后，赵兄在报上发表的文字，大概就本这个意见立言的，我很欣羡我们的意见，大体不谋而合”，并且肯定《延安一月》“全篇的叙述或批评，都是很忠实的。”

重温这篇不足千字的序言，我们有理由相信，张恨水这种以“客观”、“忠实”为精髓的写作 “意见”，正是他在抗战创作中坚持现实主义原则的思想印证，也是他影响帮助别的作家突破当时政治偏见如实写作的最佳点化。张恨水自身不是阶级斗争与革命论者，但他严格按生活的本来面目去写作，在场面真实描写中自然而然地流露自己的爱憎，他笔下描写过的国统区的人情世态和陪都雾重庆的林林总总，真实地表现了老百姓的不幸，统治者的歹毒，不仅是作者坚主民主立场与思想的体现，而且还能自然而然地让读者看到其中鲜明的阶级对立与不可调和的矛盾，进而激发抗争的愿望，这种清醒的现实主义创作路子往往能产生形象大于思维的效果，正如鲁迅所说的那样：“其实只要写出真情，……是非曲直，昭然具在，揭其障蔽，便是公道耳。”

另一部值得今天特别推荐的抗战作品乃是先生创作的长达33万言的小说 《虎贲万岁》。这是一部自1945年5月写到1946年4月，由重庆的南温泉写到北平东交巷，整整花费一年时间的倾心力作，是作者自以为“写下八年抗战中最光荣的一页”的重头作品。先生以满腔热忱，颂扬的立场，以“尽可能地保留故事真实性”、“没有一点捏造”的严肃态度，全景式地表现了震惊中外的常德保卫战过程，再现了常德守军57师师长余程万率领八千官兵对抗三万余众日军十六昼夜，战至弹尽粮绝，仅余不足百人，重创日军五千余人，为大包围大会战赢得时间并取得最后胜利的伟迹卓举，整个故事写得悲壮激烈，感天动地。与先生抗战期间创作的另一部军事题材小说《巷战之夜》不同的是，它属于完整记载一场战役的纪实体小说，被称为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军事纪实小说。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关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在抗战期间浴血奋战的事迹我们会在较多的文艺作品中看到可歌可泣的反映，相比较而言，关于国民党在正面战场所进行的抵抗和牺牲，在大部头作品中予以反映则十分有限。张恨水当年倒是能从坚主团结抗战的立场出发，全面关注抗日战场，他在《虎贲万岁·序》中写道：“七年来，还没有整个描写战事的小说，这是我们文人的耻辱，对不起国家”；“我们战役可以写的，有长沙一战，宝山之役，津浦一战，台儿庄之役，晋北一战，平型关之役，桂南一战，昆仑关之役，湘中三次会战，长沙之役，最近湘西一战，就是常德之役了。”可见先生不仅关注国民党军队的战事，亦关注共产党军队的战事，认为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由此足以证明先生政治上地地道道奉行的是团结抗战的统一战线立场，写作上是老老实实的践行现实主义方法，这对于我们今天以文艺为桥梁，沟通大陆与台湾的血脉亲情，弘扬抗战精神，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无疑也是一个非常亲切的话题与纽带！至于先生当初对抗战的多次重大战役认为该写而未写，检讨原因在于自己“是个百分之百的书生”，“没到过战场”，故而“无法下笔”，后来之所以把常德之战写入小说，完全得助于两位参加过常德之役的战士“上门请命”，并提供了充足材料，使作者较为深入地了解到这场战役意义非凡：“一师人守城，战死得只剩八十三人，这是中日战史上难找的一件事”，“我们终于是把敌人赶跑了”。由于这次会战最终是以日军受到重创而被迫退却为结局，故足以证明中国士兵的作战能力——虽处于极大困难之中，但能够渡过难关，击退敌人，无怪乎在开罗会议期间，中美英三国首脑听到常德保卫战的消息无不表示欣慰，罗斯福还专门向蒋介石当面询问了常德军番号和主将姓名，并一一记在自己的备忘录上。

综上所述，张恨水受民族大义与良知的驱使，坚主团结抗战民主的立场，小说流变终于“从遥远的过程，迂徐而踏实地向现实主义道路”迈进，经历了游戏人生——叙述人生——批判人生等不同阶段，在抗战期间达到现实主义的新境界，尽管在作品中会时而露出某些消遣意味而菁芜相杂，尽管部分存在叙述拖沓的“话本痕迹”，但瑕不掩玉，遮蔽不了他抗战作品现实主义光辉，其抗战期间的优秀作品无疑为我们留下了不灭的历史光照！

注 释：

（1）张恨水《金粉世家·自序》。

（2）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

（3）李新宇《中国现代文学主题的三重变奏》（《学术月刊》1999.第10期）

（4）孔庆东《走向新文学的张恨水》

（5）新华日报《张恨水先生创作三十年》1944.5.16

（6）张恨水《郭沫若、洪深都五十了》重庆新民报1943.1.5

（7）罗承烈《我所认识张恨老》

（8）张恨水《巷战之夜》自序

**作者简介：郑炎贵，皖江文化学者，安徽省张恨水研究会副会长。**